

论大型组织中的信任问题

[美]拉斐尔·拉·波尔塔，弗洛伦西奥·洛佩兹·德·赛恩斯，

安德烈·谢尔弗，罗伯特·W·维西尼 著 王培刚 译

原载：美国经济协会《论文集》第 87 卷第 2 号，1997

近来的一些研究，包括达戈·加尔塔（1988）以及吉姆斯·科尔曼（1990）、罗伯特·普特南（1993）、福山·弗兰西（1995）的研究，都主张信任或社会资本决定了一个社会的公共机构的绩效。这些研究将信任或社会资本看成是一个社会中人们通过合作以产生社交方面有效的结果并避免象囚徒困境这样的合作处境。例如，普特南（1993）就将社会资本作为意大利各地政府的绩效的决定性因素来考察。他证明了群众积极参与公民活动的地方（这可以看作是一个高度合作倾向的表现形式）也是地方政府展现出较高绩效目标尺度（如公共物品的交付）的地方。福山·弗兰西（1995）则进一步认为公民间的高度信任说明一个社会中包括厂商在内的所有机构的较优绩活动。

在这篇论文中，我们提供了对现有的信任理论的概述，将其中的一些含义加以拓展并在多国的截面上对其进行检验。在数据中我们发现了有关这种看法的引人注目的证实。我们又要问：促使信任产生的力量是什么？按里普特南（1993）的说法，等级制的宗教阻碍了人们之间的“平行”关系，因此阻碍了信任的产生。在一个国家里，尤其是那些天主教的国家里，我们发现信任与强有力的居支配地位的对等级制度的宗教有着强有力的负面联系。

一、论证

经济学家就信任作为一种合作的倾向阐述了两种观点。源于重复博弈理论的观点认为在对手是完全理性的时候（如，在重复的囚徒困境中仅进行针锋相对的行动）的时候，信任是优先的。在重复的囚徒困境中的更高的优先会导致合作的更大可能性与持久性（David kreps & others, 1982）；另一种源于经济实验的观点则认为人们即使在一次性的相遇（如独裁者博弈或最后通牒博弈）中也能合作。这些实验表明，人们即使是面对只有一面之缘的人，同样也期望他们有公平或是合作性的行动。这两种观点都认为有人群中人与人之间更高层次的信任必与更高层次的合作相联系。

这些有关信任的观点都共有一个重要的蕴涵，那就是与经常或反复互相影响的人之间的支持性合作相比信任对陌生人或彼此之间不常相遇的人之间的有保证的合作更为重要。在后一种情况下，即使信任水平不高，象家族或合伙关系、名誉以及日后充足的惩罚机会这类东西都将使合作继续下去。这意味着在大型组织里为了使合作继续下去信任是极其需要的，在这些大型组织里成员相互间的互相影响是罕见的，因为他们难得专心于共同生产。例如，在一所大学里不同院系的成员间在行政事务上的相互影响或是政府中部门之间的特别工作组就是这方面的例子。在这里，没有信任合作就不太能维持下去，因为太少的相互影响使声望难以发展。

政府就是一种这样的大型组织。在那里，官员们必须与许多的只是偶尔碰面的官员合作，以及与一些他们再也不会碰面的公民合作以产生“公共物品”（Public goods）。这时就需要相当大的信任来确保合作。在意大利，信任度高的地区的地方政府表现得更好，因为信任使各个公务员与其他公务员及市民间的合作更好，从而使得政府工作更有效率。

公民团体或社团（参加这些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愿的，而且这些组织的成败又依赖于

很多人的合作)的成功或许也依靠信任。普特南(1993)实际上用参加公民团体和社团来度量社会资本,虽然参与它本身就是一个结果或某些关于社会中其他人的行为的基本信念。

最后,公司也是会从雇员间的信任中获益的大型组织。福库亚玛(Fukuyama, 1995)强调,对大型厂商的成功而言,陌生雇员间的合作很有必要,而这种合作还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之上的。他把高信任度国家中的大型上市公司同在信任度国家中盛行的小家族公司对比。

二、证据

我们将检验在多国截面上提出的假设。

我们对信任对大型组织绩效的作用感兴趣。在这里,这种作用是用政府效率、公民组织的参加人数、与 GNP 有关的最大型公司的规模,或更一般地说,一个社会的表现来度量的。我们的测量信任度量值来自于世界价值调查(the World Values Survey),该调查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和 90 年代初对从 40 个国家中的每一个国家中随机选出的 1 千人进行的调查。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一般来讲,你认为绝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吗?或者认为在和别人打交道时你不会过份的小心翼翼?”回答“是”的人数的百分比就是我们在一个国家里得到的信任度量值。(也可参见 Stephen Knack & Philip Keefer, 1996)。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之间的全部国家的信任相关是 0.91,因而我们采用了后面更为完整的数据。信任度最高的是斯堪的纳维亚诸国,那里大约三分之二的调查对象认为陌生人可以信任,而信任度最低的国家大多在拉丁美洲。

这里我们简要地概括一下我们的变量,表一提供了各变量的详情。在政府效率方面,我们使用了得至司法系统效率、腐败、官员品质和税收遵守(代理变量,表示税务当局的效率)等方面的投资者的调查估计值。在公民参与方面,我们使用了公民活动及职业社团的参与程度;为了度量大型公司的相关成绩,我们使用了同一个国家的 GNP 相比的该国最大的 20 家上市公司(按销售额计)的总销售额。我们有关社会成就代理变量的某些度量值仅适于政府效率;其它的则也反映了社会中其他机构的成就。我们考察了教育(与相关人口相比的高中毕业生数及由一个行业团体估计的教育充足程度)、健康(婴儿死亡率的对数)、基础设施(由一个行业团体对基础设施质量作出的估计值及由另一个行业团体对基础设施的足够程度作出的估计值)及两项社会成就一般度量值:1970 年到 1993 年之间的人均 GDP 增长以及同期的通货膨胀(的对数)。我们的目标是通过使用多种变量和数据来源以确定结果的稳健性;我们也考察了很多其它的变量,得到了类似的结果。

表 2 提供了按 1994 年人均 GNP 对数检验的大型组织在信任方面的表现度量值的回归。我们在大多数回归中,由于我们没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因变量,所以我们只有不到 40 个的观察值。由于在较富裕国家的信任程度较高,对人均 GNP 的检验会减少信任的效应。如果在财富生产中信任是一种投入的话,那这可能造成信任的效应被低估。在其它(未被报告的)设立中,我们也检验了没有太大效应的不等量。我们使用了一个有关信任的单标准差变化(大约 15 百分点)来解释这些系数。

信任对于绩效的效应不仅是统计显著,而且数量巨大。固定人均 GNP 常数,信任中一个标准差的增加可以提高一个标准差中的 0.7 的司法效率,有关反腐败得分及 0.3 的税收遵守。普特南(1993)有关意大利的 0.3 的官员品质似乎在世界各地得到证实。另外,信任中一个标准差的增加可以提高 0.7% 的公民活动参与率和一个标准差的专业团体的参与率。信任对大型公司在经济中的份额的效应也是巨大的:信任中一个标准差的增加可以提高 7 个百分点的份额或标准差的一半。这些结果支持了福山(1995)的看法,即信任使所有的大型活动,而不是仅仅是政府大型活动,变得更容易。

表 1 对在表 2 和表 3 使用的变量的说明

变量	定 义
人际间的信任	在被问及“一般说来,你会认为绝大多数的人是可以信任的或认为在和别人打交道时你不会过份地小心翼翼”时回答说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调查对象的百分比。来源:世界价值调查 1990-93 (WVS)。
司法效率	“法律环境的效率和廉正,因为它影响到工商界,尤其是外国厂商”的评价 1980 年到 1983 年间的平均水平。从 0 到 10 赋分,得分较低表明较低的效率水平。来源:商业国际公司 (1984)。
腐败	如果“政府高官可能要求特殊报偿以及以进出口许可、交换控制权、征税估值、政策保护或贷款的有关的贿赂通常被认为是遍及政府下层部门的非法报偿时评分不高。从 0 到 10 赋分。1982 年到 1995 年间 4 月和 10 月的月度指数的平均水平。来源:国际国家风险导读 (ICRG)。
官员品质	得分高表明“政治压力下的自主权”以及“在政策没有重大的改变或没有政府行政部门打扰的情况下进行治理工作的实力和知识技能。”从 0 到 10 赋分,得分较高表示效率是较高的。1982 年到 1995 年间 4 月和 10 月的月度指数的平均水平。来源:ICRG。
税收	税收遵守水平的评价,从 0 到 6 赋分,得分较高表明遵守情况较好。来源:全球竞争力报告 1996 (GCR)。
公民参与	每位普通公民参与的公民活动的百分比,活动包括:(1)为老年和贫困者举行的社会福利服务;(2)教育、艺术与文化活动;(3)地方社区事务;(4)对自然资源的保护、环境、生态;(5)与青少年活动;(6)体育活动或文娱活动;(7)卫生保健的志愿者协会。来源:WVS。
专业协会参与	在问及是否是专业协会的成员时,作出肯定回答的调查对象的百分比。来源:WVS。
销售量前 20 强 /GNP	最大的 20 家上市公司的销售额对 1994 年 GNP 的比率。一国的公司以销售额排列。来源:1996 年全球观察数据库。
基础设施质量	“总部与业务部门之间及一个国家内的通讯设施及问题”的评价,以及运输的质量。1972-1995 年间的平均数据。从 0 到 10 赋分,得分较高,质量较优。来源:BERI 的经营风险指数。
基础设施的充足性	平均或从五方面计分来度量一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在以下每一领域满足工商业需求的程度,这些领域是:(1)道路;(2)空中运输;(3)港口;(4)电信;(5)电力供应。从 0 到 6 赋分,基础设施较优的得分较高。来源:GCR。
婴幼儿死亡率对数值	1993 年或最新的可获得年份数据,每一千个出生婴儿中不满一岁的婴儿死亡数量的对数值。来源:世界大众健康指标数据库。
完成高中学生	百分比或 1985 年完成高中学业的 25 岁和 25 岁以上的男性人口。来源:罗伯特·巴罗和李琼华 (Robert Barro & Jong-Wha Lee, 1994)
教育体系的充足	教育体系满足竞争性经济的需要程度的评价。从 0 到 6 赋分,较优的教育体系得分较高。来源:GCR。
通货膨胀对数值	1970-1993 年间隐性价格减缩指数的几何平均值年度增长率的对数。来源:1995 年世界发展报告 (WDR95)。
GDP 增长	1970-1993 年间人均 GDP 的年平均增长。来源:WDR95。
人均 GNP 对数值	用 1994 年的美元价值表示人均 GNP 的对数值,除非有另外的说明。来源:1996 年世界发展报告。

家族信任	在调查对象对其家族的信任度有多大的回答的基础上打分。在调查对象表示他们信任（不信任）他们家族时，就会获得最高（最低）的打分。来源：WVS。
等级制宗教	每个国家中天主教徒、东正教徒或者穆斯林的人口数占总人数的百分比。来源：1995年世界民族标志全书；1994年世界统计数据摘要。
种族语言分布	1960年在一个给定的国度内两个被随机选择的人不属于同一人类文化语言学群体的概率。来源：世界政治和社会指标手册。

表2 人际信任和绩效

因变量	自变量			
	人均GNP对数	人际信任	截距	调整过的R ² [N]
政府效率				
司法效率	0.2959 (0.2213)	8.2093** (1.3652)	2 2.2769 (1.7766)	0.6343 [27]
腐败	0.9214** (0.1022)	4.8068** (0.7509)	-2.3608 (0.9050)	0.7316 [33]
官员品质	1.1596** (0.1927)	3.9797** (1.3544)	-4.0842* (1.6763)	0.6806 [33]
税收遵守	0.3595** (0.0913)	1.7330** (0.5840)	-0.9124 (0.7873)	0.3540 [32]
参与				
公民参与	0.0127** (0.0038)	0.1224** (0.0329)	-0.0921** (0.0308)	0.4614 [33]
专业团体参与	-0.0072 (0.0099)	0.3056** (0.0669)	0.0330 (0.0730)	0.5492 [33]
大型组织				
销售量最大的20强/GNP	0.0103 (0.0325)	0.4927** (0.1657)	-0.0374 (0.2798)	0.2433 [26]
社会效率				
基础设施质量	1.0269** (0.1413)	2.3261** (0.7970)	-3.7162** (1.2331)	0.6783 [33]
基础设施的充足性	0.5943** (0.0604)	1.2511** (0.4200)	-1.6559** (0.5837)	0.7222 [32]
婴幼儿死亡率对数值	-0.4598** (0.0484)	-1.0283* (0.5176)	6.9682** (0.4495)	0.7141 [40]
高中学业完成	1.2884** (0.4416)	10.9714** (3.4633)	-7.4405* (3.5336)	0.3474 [29]
教育系统的充足性	0.2200** (0.0858)	1.2334* (0.6771)	0.8525 (0.7736)	0.2107 [32]
通货膨胀对数值	0.0371 (0.0787)	-3.4128** (1.1502)	3.1306** (0.6494)	0.2059 [37]
GDP 增长	-0.2738 [†] (0.1548)	2.0266 [†] (1.2152)	3.5847** (1.3625)	0.0072 [39]

注释：40个国家截面的普通最小平方回归。有14个因变量被分为4个不同的组别。包括：（1）政府效率；（2）参与；（3）大型组织以及（4）社会效率的系数。圆括号内为哈尔伯特·怀特（1980）校正的标准

误，观察值用方括号标出。

* 统计显著性在 10%水平 ** 统计显著性在 5%水平 *** 统计显著性在 1%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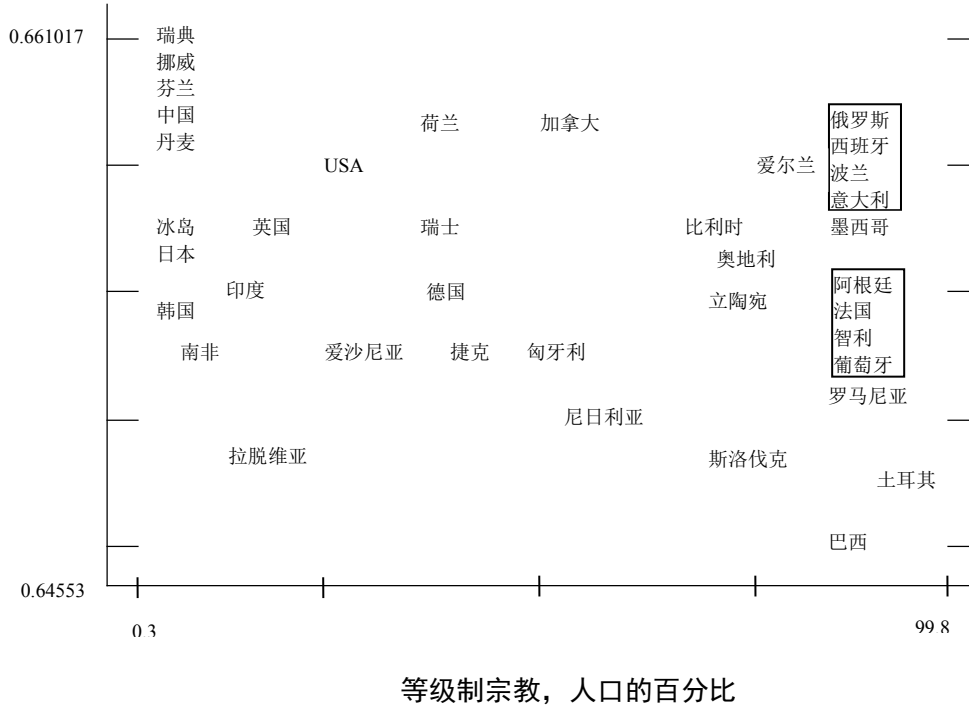
的确，福山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并指出，尤其对于企业而言，信任取代了另外一种合作机制——家族。他认为，家庭的力量对厂商的发展不利。由于《世界价值调查》问及调查对象是否信任其宗族，我们就可以实际地检验一下这一假设。当我们处理最大的 20 家公司有关信任陌生人和信任家族这两者的度量值的相关部份时，信任他人的系数是 0.654 ($t=4.1$)，而信任家族的系数是 -0.563 ($t=-3.1$)。与福山的看法一致，强有力的家族关系对大型公司的发展不利。

表 2 的最后一组提供了社会后果的结果。信任对基础设施的质量及充足性有相对不大但却显著的效应，对婴幼儿死亡率也有显著的效应，而对教育成就度量值的效应则更大。信任中单个标准差的增加可以提高 1/2 个标准差的人口中高中毕业生的百分比，以及 1/3 个标准差的学校充足性。信任也与较低的通货膨胀有关，与较高的人均 GNP 增长（对信任的每标准差增加而言，这种增长约每年 0.3%）也有微弱的联系。克纳克和基弗也得到这种增长的结果（Knack & Keefer, 1996）。总的来讲，信任可以提高全部国家的经济绩效。

三、信任来自哪里？

信任确实不可能是外生的；它可能是随着社会机构过去良好的绩效而增长。根据普特南（1993）的看法，信任是在人际间有数百年历史的“社团平行网络”上形成的习惯，涉及到商业活动和民事活动两方面。普特南认为北意大利的独立城邦促使这种平行形成，这与南意大利更为专制的政治体制形成对比。我们还能测量出比信任更基本的东西吗？

图 1 依据属于等级制宗教人口百分比标绘的人际间信任



普特南（1993）认为通过把一种经常和国家合作的等级结构强加给社会，天主教会妨碍了信任的形成。“意大利教会组织更突出的特征是权力的，而不是共同参与的平行联系”（P107）。他的论点可以更广泛地运用于任何在一个国家中占优势的、等级制的、有组织的宗教，因而在全部国家中可以被实证地检验。

具体地说，对于每一个国家，我们考察了属于一个等级制宗教（规定为天主教、东正教或是穆斯林）的人口百分比。样本中这个变量的平均值是 55%，且它和信任的相关是值得注意的-0.61（参见图 1）。这种相关（及下面所有的结果）基本上是由天主教与信任之间-0.47 的相关引起的，尽管伊斯兰教及东正教占优势的国家的信任度也很低。在表 3 中，我们将这个等级制宗教变量作为一个自变量来解释组织绩效。固定人均收入常数不变，等级制宗教更占优势的国家司法效率较低，腐败更严重，官员品质更低下，逃税率更高，公民活动参与及专业团体参与的比率更低，大型公司在经济中的重要性水平较低，较差的基础设施及较高的通货膨胀。婴儿死亡率、教育成就及增长的结果也更不明确。还有，等级制宗教对大型组织的绩效有害的证据是有力的。我们也处理了两段设定，在处理过程中等级制宗教是作为度量信任的一种工具。在量值和统计显著性上，结果与表 2 的相似。

这个证据表明等级制宗教和不信任都可能反映社会中某些内在的不利于大型组织绩效的基本“因素”，这一因素可能显示社会中的机能不良的机构。但如果这样的话，那这基本上是一种部份与等级制宗教（而且不是仅与最近发生的事情）有关的长期机能不良。令人关注地，这个因素并没有显示社会里的源自某民族文化传统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被视为是不信任的来源：信任与人类文化语言学的异质性标准度量值之间的相关仅为-0.12，而且在表 2 的回归中该度量值的包含没有改变信任的重要性。

表 3 宗教与绩效

因变量	自变量			调整过的 R ² [N]
	人均 GNP 对数	等级制宗教	截距	

政府效率				
司法效率	0.7420**	-0.0233**	2.4936	0.5245
	(0.2357)	(0.0067)	(2.4613)	[27]
腐败	1.0740**	-0.0148**	-1.1331	0.7025
	(0.1171)	(0.0051)	(1.2028)	[33]
官僚品质	1.2376**	-0.0214**	-2.1445	0.7583
	(0.1493)	(0.0054)	(1.5465)	[33]
税收遵守	0.3985**	-0.0088**	-0.1415	0.4335
	(0.0767)	(0.0029)	(0.6727)	[32]
参与				
公民参与	0.0164**	-0.0003**	-0.0589*	0.4106
	(0.0035)	(0.0001)	(0.0274)	[33]
专业协会参与	0.0002	0.0010**	0.1393	0.5256
大型组织	(0.0105)	(0.0002)	(0.1104)	[33]
销售量最大的 20 家公司/GNP	0.0370	-0.0020**	0.0077	0.3387
	(0.0263)	(0.0006)	(0.2668)	[26]
社会效率				
基础设施质量	1.0725**	-0.0172**	-2.3035*	0.7835
	(0.0955)	(0.0039)	(0.8967)	[33]
基础设施的充足性	0.6252**	-0.0057*	-1.1572*	0.7480
	(0.0550)	(0.0021)	(0.5270)	[32]
婴幼儿死亡率对数值	-0.5044**	0.0016*	6.9040**	0.6919
	(0.0473)	(0.0018)	(0.4794)	[40]
高中学业完成	1.7590**	-0.0409**	-5.4915	0.3814
	(0.4573)	(0.0142)	(4.3376)	[29]
教育系统的充足性	0.2680**	-0.0016	0.9735	0.1597
	(0.0820)	(0.0028)	(0.7854)	[32]
通货膨胀对数值	-0.0915	0.0087*	2.5343**	0.0991
	(0.0784)	(0.0035)	(0.7381)	[37]
GDP 增长	-0.1944	-0.0030	3.8230*	-0.0206
	(0.1622)	(0.0069)	(1.6884)	[39]

注释：14 个因变量被划分为 4 个不同的组别，包括：（1）政府效率；（2）参与；（3）大型组织以及（4）社会。我们报告了异方差校正的普通最小平方（怀特，1980）。圆括号内为标准误方括号内为观察值。

* 统计显著性在 5%水平 ** 统计显著性在 1%的水平

四、结论

信任促进合作，尤其是在大型组织里。政府绩效的数据表明，公民及专业协会的参与，大型厂商的重要性以及不同的社会全面绩效都支持了这个假设。而且，在等级制宗教占优势的国家里信任度较低。因为它阻碍了人们之间“合作的平衡网络”的形成。尽管经济学家们持怀疑态度（参见罗伯特·索洛，1995），但在检验多国截面时信任的理论却保持得极为出色。

译者单位：武汉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

邮 编：430060

